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

精华

新唐书（一）

主编 廖盖隆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读《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认为刘昫的《唐书》浅陋，命宋祁、欧阳修重修唐书，参预其事的人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义叟等人。宋祁擅长文学，他在天圣(1023—1032年)末年至庆历(1041—1048年)年间的十七年中，完成了列传。后来欧阳修主持修史工作，写定了本纪、志、表。这已是至和元年(105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的事情。宋祁和欧阳修两次修史，中间隔了好多年，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旧唐书》本纪大约有三十万字左右，《新唐书》压缩到不足十万字。个别的帝纪，删减的更为厉害，如《哀宗纪》，《旧唐书》有一万多字，《新唐书》只有千字上下。经过大量删削，失去了许多可贵的史料。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唐书》本纪的“简”倒不如《旧唐书》的“繁”。

《新唐书》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食货志》有关授田情况和租庸调的记载，比旧志丰富得多。《地理志》各道疆域以唐全盛时期的开元年间十五道为依据，户口以天宝年间为标准，州郡建制沿革以天祐年间为主，处理得较为得体。《艺文志》在《旧唐书·经籍志》之外，增收了很多图书，仅唐人文集就由一百余家增加到六百多家。《旧唐书》没有《选举志》，《新唐书》效法在它之前成书的《旧五代史》，写了《选举志》，记载了唐代的科举制度。

不仅如此，《新唐书》的志还有新的创见。它增加了以前各史没有的《仪卫志》和《兵志》。《兵志》没有能够详述制度的演变，但毕竟记载了唐代军制的废置得失和治乱兴亡，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继《新唐书》创立《兵志》之后，许多史编写了《兵志》，为“二十四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它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泯灭的。毛泽东对《新唐书》也很喜欢读，批注也较多。

马周的才德

毛泽东曾经十分注意唐太宗时虽出身低微然而为成就贞观之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马周的事迹，以此为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历史借鉴。

《旧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武德年间，补任博州助教，“日饮醇



耐，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又为浚仪令崔贤首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马周不为乡里敬重，仕途也历经挫折。后至京师，借住在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三年，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评说政治得失，马周于是为常何代拟了二十余条意见建议，请常何奏上，而“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后来又连续提拔。“帝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马周几次上奏，都得到“帝善其言”，“帝称善”的反响，史书记述说：“（马）周善敷奏，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时誉归之。帝每曰：‘我 不见周即思之。’”唐太宗曾经亲笔书赠马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体现出对他的充分信任和莫大期望。马周因病48岁去世，“帝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毛泽东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用粗重的笔迹写道：“马周，年四十八”。

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马周传》卷后赞语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马周有王佐之才，是时唐太宗锐意创建，而马周的意见都切合当时实际，可以称作“以明佐圣”，所以“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是很自然的。赞语



以为唐太宗发现和任用马周，与商王武丁访得版筑于傅岩之野的傅说，任以为相，致使殷商中兴，以及周文王遇垂钓渭滨的吕望，号之为太公，后辅佐武王灭商，并没有什么不同。遗憾的是马周才具不及傅说、吕尚，以致后世少有称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评价，他在这段赞语的天头批注：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毛泽东还十分赞赏马周贞观六年批评朝政的奏疏。马周提出宗室功臣子孙不必世官，以为“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他还强调，“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应当“审举之为重”。马周说，历代衰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王，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马周直接批评时政，指出：“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他引述汉代政治史的教训，指出，“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马周警告说：“世闻昧旦



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马周总结历代农民起义推翻专制政权的历史，指出，“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他认为，“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纣笑桀之亡，而幽、厉笑纣之亡，隋炀帝又笑齐、魏之失国也。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马周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躬为节俭的情形，说道：“以陛下之明，诚欲厉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但及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马周还称引贾谊削抑诸侯王之策，指出虽然目前尚看不到危机之迹，“然则万代之后，不可不虑。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皆由树置失宜，不豫为节制，以至灭亡。人主岂不知其然，溺于私爱尔。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他建议对这种危险预为防范，“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

对于当时吏治之弊，马周也严肃地予以批评。他指出：“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



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高级官员“多武夫勋人”，是历代王朝立政初期的普遍情形。往往在推行“功臣政治”的历史阶段之后，又由其子孙承继权位，出现“功臣子政治”的局面，由此导致“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的情形。大致由“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转变到“贤臣政治”与“能臣政治”，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马周在唐王朝破刘黑闥、徐圆朗，“于是河、济、江、淮诸郡邑皆平”，真正实现统一9年之后，就清醒地看到并勇敢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眼光。

在《新唐书·马周传》记录马周贞观六年上奏这段文字的天头，毛泽东批注：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毛泽东肯定了马周的政治历史才识，实际上也肯定了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的才略与魄力。

《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关马周的记载并不多，但他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磨灭，毛泽东认为他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这种评价并非定于一尊，也算史学一家之言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评价马周这位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

毛泽东对出身卑贱、年轻有为的人比较偏爱，马周其一例也。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对《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都有很多圈画。在《新唐书》的封面上有毛泽东手书的目录，其中《徐有功传》，画着曲线。

《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道：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徐）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诸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出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

毛泽东读此，欣然命笔批注：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据《旧唐书》、《新唐书》本传记载，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这两部史书都称赞徐有功“为政宽仁，不行

杖罚”，“为政宽仁，不忍杖罚”。毛泽东在这两处都逐字加了旁圈，后者还在句末画了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套小圈。这种读书标记，在文内还有多处，有加重和特别强调的意思，是毛泽东在其他圈画批注中较少见到的。传记中有关徐有功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许多事迹，毛泽东多有圈点，十分重视。

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周兴、来俊臣等人，重赏鼓励告密者。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无所畏惧，“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这一段，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

润州刺史窦孝谿妻庞氏，被诬陷判死。徐有功了解到庞氏无罪，为之申辩，而自己却被判庞氏死刑的人所弹劾，说他包庇罪人，应获死罪。有人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安步去”。毛泽东在两篇传记的这段记载中，都逐字加了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还在其中一篇传记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新唐书》接着这一段，是武则天质问徐有功，问他为什么最近断案多有差错。徐有功回答说：“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因而免去庞氏的死刑，同时也将徐有功免职为民。对徐有功的这段回答，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句末加了套圈。

博州刺史琅玕王李冲谋反，颜余庆被诬陷为同党，来俊臣等先判颜流放，后又判颜死刑，并经武则天批准。徐有功据理



为颜余庆辩护，说他是支党，不是魁首，罪不该死。他批评武则天：“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发，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则天大怒，问：“何谓魁首？”徐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无谋。”最后，武则天被他说服，“遂免死”。当徐有功和盛怒的武则天争辩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对这一段，每句后加了套圈，有的逐字加以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套圈。

徐有功执法不徇私情。皇甫文备曾弹劾徐有功“纵逆党”，并将他逮捕入狱。后来，皇甫文备又被别人弹劾入了狱。徐有功为他往来奔走，澄清事实，营救其出狱。有人问徐有功，皇甫文备曾陷你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救他。徐有功回答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毛泽东对此逐字加旁圈，句末加套圈。

《新唐书》中赞扬徐有功说：“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辩，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甚众，酷吏为少衰”。毛泽东对“凡三坐大辟，……后以此重之”几句，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也画了三个大圈。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作者们的笔下，徐有功耿直公正的品格，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感人至深。毛泽东读这篇传记，十分动情。他圈



画批注时经常使用的那些标记，似乎已不足以表达这种深刻的感受，意未能尽、因而多处加上不常使用的套圈、三角、叉等标记。徐有功在一次被弹劾罢官又被启用时，他给武则天写了一份奏折，这就是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大意是说，生活在山林的鹿，很难逃脱被猎杀，成为人们厨房里俎头肉的不幸命运。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多次蒙冤入狱的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正直执法人员在封建社会里常有的下场。毛泽东在这些话旁，每字都画了三角标记，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

但毛泽东不同意徐有功“命系庖厨”的说法，认为为执法护法而死，以身殉志，是很伟大的。毛泽东为徐有功动情，他从徐有功谈死，联想到许多人。其中，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元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子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



害。这些人，有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永垂青史。毛泽东很推崇这些人“以身殉志”的崇高气节。

在一些场合，毛泽东还经常借一些“以身殉志”的古人，对干部队伍进行教育。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演讲时，毛泽东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旧唐书·姚崇传》和《新唐书·姚崇传》，毛泽东都曾非常仔细地阅读过。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题头，毛泽东用黑铅笔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姚崇在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史书记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姚崇曾受到武则天赏识，任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为宰相称号)；中宗复位后，出为地方官；睿宗即位，姚崇再次入相，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被贬为申州刺史，移任徐、潞、扬、同等州，为政简肃得人心。公元713年，玄宗召入为相，他提出10条建议，奏言：“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这“十事”的内容是：政先仁恕；不求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与政；杜绝戚里公卿方镇贡献以自媚于上；皇亲国戚不得任职中枢；君臣接之以礼；提倡直言谏诤；停止营建寺观；禁止外戚干政。“十事”基本为玄宗所采纳。姚崇任职期间，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后荐引宋璟接替自己，但玄宗时常以国事咨询，“姚崇”后来成为良相的典范。姚崇针对武后专权以来的弊政而提出的“十事”，《新唐书·姚崇传》的原文是：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

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

比来任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

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寢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

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

先朝褻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

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谏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



道佛营造，可乎？

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唐玄宗回答说：“朕能行之。”姚崇才接受委任。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

如此简单明瞭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新唐书》的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在《姚崇传》和《宋璟传》后评论说：“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又批注道：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道”，大致是指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所谓“方法”，大致是指政治方式、政治策略。

以上是体现姚崇的“大政治家”的一方面。此外，姚崇不信鬼、不信神，他相信“人定胜天”的真理。以下几处记载，毛泽东都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以示重视，有的写有批注。

（1）开元四年（716），山东一带发生蝗害，老百姓不敢捕杀，却拜祭天地祈福灭灾。姚崇命令捕杀蝗虫后用火烧焚，彻底消灭。他的这一措施不为当时的一些人所理解，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姚崇写信给他：你坐视蝗虫为害，无所作为，大灾之后老百姓无以为生，你还能做什么刺史？倪若水害



怕了，只得遵命灭蝗，结果捕了10万担蝗虫，引起极大的震动。唐玄宗对灭蝗也有疑虑，姚崇对他说：“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毛泽东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姚崇接着举例说：以前魏时，山东发生蝗害不敢灭，最后草木皆尽，人相食，牛马互相啃毛。我们现在如不灭蝗，任其繁殖，其后果必将是老百姓“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退一步看，即使蝗未灭尽，也比纵容它造成大灾好。黄门监卢怀慎害怕灭蝗，劝阻姚崇说：天灾怎能用人力制服，杀蝗多，会伤害老天和气的，请你三思。姚崇说：“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姚崇为了贯彻灭蝗措施，与上下左右展开艰苦的说理斗争，没有“人定胜天”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2)唐玄宗准备东巡祭太庙，正当其时，太庙的房子忽然坍塌了。许多大臣劝玄宗说：这是上天暗示你不宜东巡。姚崇却说：这座太庙是魏时苻坚所造，距今300多年了。山都会因朽坏而崩陷，何况土木建筑的太庙呢？这与你的东行并无关系。你东巡是为抚恤老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现在，行前的各种准备都已就绪，不宜改变。太庙坏了，可以盖新的。唐玄宗听后很高兴，说：“卿言正契朕意。”姚崇不信鬼神的清醒头脑，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3)姚崇遗嘱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并列举翻译佛经的姚兴，出过家的梁武帝，入过道的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渡人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他们都未能长寿，而“王帝之时，父不



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注：传说故事中的人物，生于夏代，据说活了800余岁）、老聃（注：相传即老子，春秋时人，据说活了160—200余岁）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耶？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对“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逐字加了旁圈。对这一段，毛泽东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他在姚崇之后八九十年写了《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猛烈攻击佛教，盖源于此。

姚崇生活在1000多年前佛教盛行的唐朝，特别是最高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戚等笃信佛教，大造佛寺，劳民伤财，超度老百姓为僧尼，影响国计民生。姚崇清醒地看到这一切，他不仅自己不信佛，以佛不能挽救人的生命这一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弟，还上书唐玄宗，要求他不再营造寺观，阐述“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观点。唐玄宗接纳他的意见，使12000多僧尼还了俗。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赞他是“唯物论者”。

两个好将军

《新唐书》卷一四八中的《田弘正传》载：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修



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

在这里毛泽东批道：“田弘正，好将军”。（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

《新唐书》卷一四八中的《王承元传》载：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盍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

在此，毛泽东又批道：“青年将军王承元”。（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

田弘正、王承元，是唐宪宗、唐穆宗时的将领，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中央政府。田弘正先后出兵帮助朝廷讨伐吴元济的反叛，逼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元之兄）归唐，又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战功卓著，故毛泽东说他是“好将军”。王承元十几岁继任指挥其兄节度的军队，调制有方，诸将皆能听命。后在凤翔一带领兵抗击吐蕃少数民族的入侵，使境内居民，“人乃告安”。死时才33岁。所以毛泽东称他是“青年将军”。

都是英俊天才

毛泽东在读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